

Winter 2016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December No.35

2016年12月 第三十五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35 期
2016 年 12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6年11月4—6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为主题的第13届北京论坛(2016)召开，三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各界领导相聚金秋时节的北京，共同探讨文明在促进全球互信合作、资源共享中的重要作用。



P.08

→ 2016年10月21日上午，首届山东论坛在山东大厦开幕。本届论坛主题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历史、现在与未来”。

特稿

- 02 第13届北京论坛(2016)召开
- 08 首届山东论坛召开
- 15 图们江论坛2016召开

学术活动

- 17 “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学术研讨会举行
- 19 “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 21 “中国东南亚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研究进展

- 27 Ubi bene, ibi patria. 大抵心安即是家
——祝贺顾彬教授七十华诞(下)



第 13 届北京论坛 (2016) 召开

2016年11月4—6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为主题的第13届北京论坛(2016)召开，三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各界领导相聚金秋时节的北京，共同探讨文明在促进全球互信合作、资源共享中的重要作用。

11月4日上午，第13届北京论坛(2016)开幕式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主持开幕式。朱善璐在致辞中表示，

北京论坛是一个影响广泛的世界性学术论坛，自2004年创办以来，北京论坛走过了12个春秋，得到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大力支持。北京论坛不仅始终牢记宗旨、勇担使命，而且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通过研究、学习、交流和探讨，积极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提出见解和思考。朱善璐说，不同文明在和平环境中的交汇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凝聚了不同民族的贡献，文明之间的对



朱善璐

话要充分交流不要相互排斥，要充分吸收借鉴不要取而代之，这样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和共同繁荣。

朱善璐还宣读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主促进会成员严隽琪的贺信。严隽琪对北京论坛的顺利开幕表示祝贺，并高度肯定了北京论坛的发展与成就：北京论坛的主题契合当前的时代背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关注，描绘了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路径。严隽琪希望与会学者凝聚共识，广泛传播和平、理性、包容、互信的理念。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致辞中阐释了本届论坛的主题词“互信、合作、共享”的深刻内涵。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复苏低迷的处境，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和平与发展虽是时代主题，但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在这种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互信、合作、共享尤为重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他进而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我们在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进行教育事业建设的同时，应继续推进教育领域的有序开放，进行政府间关于教育的高层磋商，推动教育交



郝平

流，使教育更好地发挥人类交流的载体、维护和平的纽带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S.Iqbal Riza)随后致辞，并带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视频致辞。伊克巴勒·里扎首先祝贺北京论坛成功开幕，并对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的逝世表示遗憾。他说，北京大学是中国一流学府、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国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期，即将迎来新任联合国秘书长——葡萄牙前首相安东尼奥·古特里斯。他希望通过北京论坛的对话与合作，促进不同国家和谐友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成长与共同繁荣。

潘基文在视频致辞中对大会的成功开幕表示祝贺。他提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关注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也已经生效，全世界还可以在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上作出更多的努力。最后，他感谢大家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并预祝本届会议圆满成功。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H.E. Shaukat Aziz)在致辞中分享了自己对世界发展



肖卡特·阿齐兹

新范式的理解与展望，认为互信合作在世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大国的领导力是这种新范式的有力保障。当提到威胁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问题时，他倡导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对难民施以援手，各国发挥合力而不是互相封堵，用积极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他还肯定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推进世界金融体系改革中的作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中，世界金融体系也应作出相应改革，提高工作效率，展现领导力。肖卡特·阿齐兹表示，未来各国更需要加强合作与对话，互相信任，达成共识，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世界。

韩国 SK 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在致辞中表示，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技术发展带来的失业率增长、经济停滞等问题亟待解决。共享经济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亚投行便是推进跨国合作的典型范例。为了应对超越国界的快速变化，我们需要加强交流，达成共识，培养合作、共享、互信的精神，惟此才能把握未来的方向。北京论坛作为文明对话交



崔泰源

流的重要先驱者，提供了一个探讨如何应对未知领域的有效平台。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进行总结致辞。他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对与会嘉宾和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多样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只有秉持多元、平等、包容的原则，文明才得以传承和延续，前景才更加光明。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已成为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要共享发展的红利，也要共同承担义务。互信、合作、共享三者紧密相连，在多元文明共存的时代，各国大学不仅要保持对本国文明和文化的自觉，更要拓展国际视野，通过合作交流，形成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他期待学者们通过北京论坛的平台，积极建言献策，共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北京大学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论坛发展。

在特邀报告环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董事会主席金立群发表演讲。他表示，全球化为各国人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治理，让不同国家参与其中，共担责任。亚投行的任务便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调动成员国



朴仁国

参与到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进程中。亚投行致力于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实现各国的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亚投行目前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通过其指导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还计划动员私人资本，打造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和网络，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他还表示，本届论坛“互信、合作、共享”的主题与亚投行的使命高度契合，“让我们携手共进，继往开来，实现共同繁荣”。

开幕式的主旨演讲环节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国际社会学学会前会长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梅瑞克·格特勒（Meric Gertler），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分别发表了演讲。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演讲中分享了他对“结构性危机”的认识。他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结构性危机，它形成于16世纪，到19世

纪扩展到全球，其特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而进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而不符合其特征的其他行为体则会受到惩罚。这样的资本积累是一个不理性的目标，因为社会发展存在一个均衡状态，而现在资本积累的体系推动了其偏离均衡状态，进而导致了结构性危机的产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介绍了两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要的周期性节律：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和霸权周期，并分析了关于如何应对结构性危机的“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分歧和斗争。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保持乐观来建立所希望的世界体系，因为当体系远离平衡时，其表现出一定的“自由意志”，每一点投入都可能会促使其重回平衡的状态。

梅瑞克·格特勒以“国际合作：创建全球繁荣的大学和城市角色”为题作了主旨演讲。他首先交待了国际合作的背景：当下有两股力量左右着地缘政治，一股力量主张退出国际交往，如英国脱欧后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要求公投、特朗普以美国为尊的设想等；而另一方面，全球性挑战与日俱增，国际移民、传染病等问题要求国际合作。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两股力量要如何调和呢？梅瑞克·格特勒认为存在第三种力量可以作为调和的要点——研究和知识领域的国际合作。当今世界城市之间和大学之间的联系大大推进了国际合作的实现。从全球知识生产网络、专利分布热点与国际合作区域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两者呈现一定的关联性。最后，梅瑞克·格特勒表示，在地缘政治的两股力量博弈之间，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和知识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以带来新的世界繁荣。

俞可平以“互信合作与全球化”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提到，全球化让全人类成为



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将各民族国家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到一起。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全球安全和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来看，一方面，全球治理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还远远落后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面临全球治理的这种现状，俞可平提出，我们在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时，还应该怀有一种“全球善治”的共同理想。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人类治理的理想状态，它为全球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全球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俞可平指出，只有各主权国家通力合作，跨国企业和全球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大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才能实现全球善治，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球化。

此外，意大利前总理、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雅克·德洛尔研究所所长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蒙古国前总理、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前议员阿马加苏·瑞驰尼曼（Amarjargal Rinchinnyam），多伦多市执行长彼得·华莱士（Peter Wallace），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咨询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家汉办，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机构的嘉宾和驻华使节也参加了本届北京论坛。

第13届北京论坛（2016）为期3天，共设7个分论坛和一个学生论坛，主题分别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界文明中的巨型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视角；中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作用；生态安全与生态城市：国际经验

与中国实践；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社会企业概念构建与认证制度发展。学生论坛主题为：大变革时代的全球治理——世界青年的视角和声音。

11月6日，第13届北京论坛（2016）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闭幕式。数百位学者与其他参会代表出席，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闭幕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倡议与举措”为主题作了主旨报告。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强调了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发展背景下，“一带一路”是中国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我国结合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基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这三个方面的优势，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既给沿线国家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遇，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林毅夫总结到，“‘一带一路’是实现文明的发展和共同的繁荣，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契机”。

闭幕式致辞环节中，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对本届北京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了祝贺，并对所有组织者和志愿者表示了感谢。他认为，在过去的三天里，与会学者代表针对互信、合作、共享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意义深远。最后，他引用中国诗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对北京论坛越办越好的未来展望。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黄侃在闭幕式致辞中代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北京论坛（2016）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与会嘉宾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充分肯定了北京论坛多年来的

稳步发展以及其在国际性、学术性、影响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北京论坛已经成为北京市依托学术与人才优势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闪亮名片。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我们有决心将大学办好，将论坛办好，承担使命，为世界发展和民族繁荣做出努力。他谈到，文明对话不对抗，论坛交流不交战，希望北京论坛能够吸引更多各个领域的学者、青年、大学校长等前来参与。

13个春秋的沉淀，北京论坛的影响力和规模不断扩大，除11月4—6日的主论坛外，2016年的北京论坛还走出国门，于5月24日在巴基斯坦成功举行北京论坛首届海外分论坛“北京论坛（2016）·伊斯兰堡”，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和巴基斯坦”。来自中巴两国的专家学者就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展开了对话，共同回顾了中巴两国建交以来走过的65年辉煌历程，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中巴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契机。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端论坛，北京论坛秉承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为广大专家学者提供了跨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经过13年的磨砺与成长，北京论坛所倡导的文明和谐理念持续深化，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在未来，北京论坛仍会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交汇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照片由北京论坛秘书处提供



首届山东论坛召开

2016年10月21日上午，首届山东论坛在山东大厦开幕。本届论坛主题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历史、现在与未来”。

中国外交部原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出席活动并作了主旨演讲。山东省副省长夏耕，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分别致辞。韩国首尔大学金光亿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Keith E.Maskus 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教授、山东大学原校长曾繁仁教授、山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薛庆国、山东省经信委

副主任李世瑛、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琬，以及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主持。

张荣在致辞中说，很高兴在山东大学建校115周年之际与大家相聚泉城济南，共同迎来山东论坛这一盛会的隆重举行。张荣说，山东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尚功效、求革新的齐文化与崇伦理、重传统的鲁文化相互交融，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对日韩和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齐鲁大地这种深厚文化底蕴将赋予山东论坛独



李肇星



朴仁国

特而长久的人文魅力。山东大学始终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形成了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和学科特色，并于去年成功举办了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今，山东大学有义务、有责任、有信心，为办好山东论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张荣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期望：一是从历史寻求解决问题的智慧。受儒家文明影响较深的东亚地区，可以而且应该从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智慧，化解区域治理中面临的困难与分歧，构建促进和平发展的机制和渠道。二是于现实拓展沟通互信的空间。目前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各国专家学者应该利用好山东论坛这个平台，共同作出努力。三是为未来探索合作共赢的途径。山东论坛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导向型、目标引领性的高端智库平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聚焦当前东亚地区面临的问题，积极开展理性、务实、高效的交流研讨，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合作，走向共赢。

朴仁国介绍了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基本情况，表示十余年来财团以学术交流和人际交流为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现

已发展得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今后财团还将继续加强与各国亚洲研究机构的学术联络，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学术、人际交流一如既往地作出努力。他相信，山东论坛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路精英学者齐聚泉城，共商东亚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命运，将会证明山东论坛的巨大潜力。朴仁国说，我们要找一个区别于欧盟却适合于东亚地区的新的一体化模式，即立足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一体化，中国有句话叫“万丈高楼平地起”，相信第一届山东论坛一定会发展成为万丈高楼，祝愿山东论坛成为能够解决东亚地区有关课题的重要平台。

夏耕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他说，山东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文化大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大形势下，文明交流互鉴日益发展，同时也面临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相互理解、尊重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才能更好地和谐相处，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共赢发展。山东将发挥区位优势，坚持开放发展，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更加主动、更加



洪银兴



金光亿

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合作。山东大学是中国知名学府，是山东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其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举办的山东论坛，汇聚了多位重量级嘉宾、世界一流学者、全球各界精英，共同探讨东亚命运共同体演进中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区域合作与发展谋求共识，必将极大地促进各国间学术交流与社会交往，对东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产生有益影响。他希望与会学者通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真知灼见，凝聚区域合作共识，助推山东与世界各地人文经贸交流合作向着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开幕式前，会场内播放了山东大学宣传片。开幕式后举行了主旨演讲，李肇星、洪银兴、金光亿、曾繁仁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李肇星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和个人的不同经历提出“国家是历史的”的观点，认为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努力为祖国、为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事业而努力，使未来的国际秩序更合理、更民主、更和谐，使世界的明天更美好。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第一，要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李肇星说，自己去过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但心底最挂念

的永远是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相信此次论坛将产生实效，有利于建设与会者各自的祖国和家乡。第二，要明确人民至上的理念，也要明白人民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李肇星说，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此次论坛召开的奋斗目标，也是山东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其他论坛组织单位的共同奋斗目标。他说，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大家在享受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时要感恩人民。第三，要永远学习，通过学习来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李肇星指出，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继承、发扬我们自己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学习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好机会，我们要抓住机遇，互相学习，促进共同发展。

洪银兴教授作了题为“在‘一带一路’上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旨演讲。他提出，中国想在“一带一路”中与相关国家互利共赢，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以及攀升价值链中高端。他认为，过去中国企业基于劳



曾繁仁



张蕴岭



Keith E. Maskus

动力和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始终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企业在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要求经济增长更加关注质量和效益即追求附加值的增值。当前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示出来，具备了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条件。对此，洪银兴教授提出以下几方面路径：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转移；生产制造向中高端攀升；谋求在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谋求在采购者驱动的价值链的主导地位；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商业模式创新。最后，洪银兴教授表示，依靠创新驱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到现阶段的需要。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更多的是价值链走出去。这个发展机会不只是给中国的产业，也是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应在“一带一路”上寻求全球价值链的合作，无论是低端环节的转移，还是以“我”为主的价值链的布局 and 延伸，都能使相关国家得到全球价值链的红利。

金光亿教授作了题为“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through Human Resources and Culture”的报告。他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蔓延和新的通讯、科技体系的发展推动了知识和文化的跨境交流，同时国家之间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打破了文化上的同质性，可以预测，今后将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他论述了建立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认为可以通过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融合及共同生活，有效地形成共同的道德和伦理上的价值观，彼此相互尊重、相互认可。金光亿教授论述了建立东亚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困难，表示国家之间的分歧、种族偏见等都会影响到共同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建立。而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从地区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历史问题。金光亿教授就建立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能力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文化上的了解和宽容是一种方式，东北亚地区尤其需要推动文化的交流，需要充分的跨境交流、移民和通婚。金光亿教授强调，在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媒体等也需要发挥作用，推动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作为各个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并在各国人民间推广；必须采取积极的措

施来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项目，推动跨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科技的扩散。因此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东北亚大学之间建立一种合作架构，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他最后谈到，要实现建立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就必须实现一个多元化的跨国的文化、信息、科技的交流以及人员的沟通交流。

曾繁仁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中和位育’——东亚儒家文化圈共同的哲学诉求”。他主张世界哲学是多元共存的，“以西释中”是行不通的。“中和位育”是儒家“中和”论哲学的古代表述，“中和位育”之“中和”论是相异于古希腊“和谐”论的东方哲学观。曾繁仁从五个方面对“中和位育”进行了论述。一是“天人相和”之生态之思。“中和位育”与传统文化的“爱生”、“养生”、“护生”的生态智慧，对于现代社会遏制人类无尽欲望，拯救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积极意义。二是“修身至诚”之德性之思。“修身志诚”是“中和位育”观念向人生实践的落实。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志诚”，就是达到化育万物而与天地相参的境界。三是“礼乐教化”之美育之思。“礼乐教化”与“中和位育”密切相关，“中和位育”作为一种哲学诉求与理论原则在古代社会得以贯彻的重要途径是“礼乐教化”。“礼乐教化”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也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体现在东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四是“太极化生”之太极之思。《易传》的出现为“中和位育”提供了理论的前提，“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出了中和位育的内涵，揭示了东方生活和艺术的奥妙，也反映了东方人的生存方式。五是“和实生物”之生存之思。“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是“中和位育”的重要内涵。“和实生物”包含丰富的生存哲学意韵。“中和位育”观念中的“中

庸之道”、“和实生物”、“过犹不及”等为处理好人与人、国与国的发展和矛盾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东方智慧。

首届山东论坛设三个分论坛：东亚体系与区域认同、深化东亚经济合作、东亚的社会变迁与合作，通过与会嘉宾学者的对话交流，深入探讨东亚命运共同体演进中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东亚区域的合作与发展谋求共识。

10月22日上午，首届山东论坛闭幕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致闭幕辞。山东大学校长张荣，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Keith E. Maskus，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张蕴岭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由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主持。

朴仁国在闭幕致辞中表示，本届山东论坛围绕“东亚命运共同体——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一主题进行研讨，旨在推动东亚地区跨文化交流与合作。首届山东论坛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大家提供了讨论东亚各国相似性、理解各自差异性的平台，使东亚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东亚地区将成为合作紧密、互利共赢的经济体。朴仁国表示，在两天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通过聆听演讲，交流和学习了很多经验；相信“一带一路”战略会成为实现亚洲区域和谐发展的重要工具；相信东亚各国会有无限的机遇来拓展合作，实现共同目标；东亚各国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人文交流。朴仁国就东亚各国的通力合作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例如地区通用的驾照系统、互相认可的车牌照系统、东亚主要城市的足球联赛等。他提议建立一个小的研究团队，专门针对山东论坛中提到的议题进行细化研究。他以欧洲一体化为例，提出既要加快实现东亚命



运共同体的步伐，也要有耐心，同时要有高瞻远瞩的视野。最后，朴仁国强调了和平与稳定对于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重要性。

闭幕式上，张蕴岭、滨下武志、Keith E. Maskus 分别作了主旨演讲。

张蕴岭在题为“共同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演讲中谈到，邻国关系是利益、责任和命运的集合，东亚国家以地缘为连接，利益、责任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实中的东亚地区关系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用新的理念和方式来处理，并构建新形势下的新关系和新机制，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是基于理想，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张蕴岭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指出冷战结束后，大力推动伙伴关系建设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创新，是对新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个贡献。他认为，伙伴关系有利于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东

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开放的、互利共赢的。因此，从区域关系来看，改变了传统的双边关系框架，创建了新的共同参与的平台和利益共享的机制。东亚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总体上看，目前是东亚近代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维护东亚和平、开放与合作的大局，需要大家凝聚共识，共同承担责任。中国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体现的是一种共生理念、共利关系、新的国际关系范式，是基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传统大国争霸、扩张老路，做新型大国的理念和承诺。作为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的大国，中国对地区以及世界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中国身体力行，认真做好发挥引领作用的实践者。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为了推动新型发展合作，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增添新动力。东亚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共生理念，需要在理论上、认识上和行动上凝

聚共识，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和推动。

滨下武志的演讲题目为“东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演变——朝贡体系与近代东亚”。他从架桥性、综合性、模式化与国际关系、空间的历史与时间的历史几个方面论述了朝贡体系的特色。他认为朝贡体系中包含非常有特色的历史变化，拥有综合性的运作方式和历史空间模式，可以据此来讨论东亚的关系；朝贡体系不一定按照历史时间来描写，一般的历史研究以时间为线索，但朝贡体系可以从空间模式的角度讨论历史。滨下武志从地缘关系和周边关系出发，分别论述了不同研究视角下的朝贡体系。他认为，在朝贡体系研究中，海洋问题很重要，因为朝贡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洋来实现的，他阐释了朝贡与海洋利用的五层构造，认为可以通过朝贡体系的研究来认识海洋的历史变化。滨下武志从朝贡模式、东亚世界与日本的关系、朝贡与近代中国三个方面对比了自己的朝贡体系研究与费正清教授朝贡体系研究的不同。他认为，东亚的朝贡模式是同心圆式的；日本江户时代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相对来说，与东亚是开放的贸易关系；近代问题的讨论不一定从中西关系方面来讨论，也可以从东亚内在因素的变化方面来讨论，例如朝贡体系中的空间角度、朝贡的转型等。

Keith E. Maskus 作了题为“TPP 与亚洲贸易协定的未来”的主旨演讲。他系统阐述了 TPP 的协议特点、参与国家和社会影响，介绍了 TTIP、RCEP 和 FTAAP 等其他大型协定，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大型跨地区贸易协定的原因。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地区出现了纵向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致使跨国企业的纵向贸易成本增加，而大型跨地区贸易协定旨在将主要经济地区内的垂直生产合理化。对于美国在

这方面的利益诉求，他提到了在关键地理区位的贸易自由化，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一个基准，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度等方面。在 TPP 对商品的市场准入方面的影响，他谈到 TPP 可以在约 1.8 万个产品类别上实现减税或者是完全地消除关税。在 TPP 对于服务业的影响方面，他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但壁垒却非常高，而通过负面清单，TPP 可以实现服务业的自由化。谈到 TPP 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他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做的研究表明，TPP 可以减少关税，但对美国带来的经济影响非常有限，可能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不到 0.5%；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则展示了 TPP 对于预估实际收入的影响。他还分析了贸易协定产生争议的原因、中美国内关于 TPP 的讨论等问题。对于 TPP 未来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签署 TPP 协议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考虑，一方面这能吸引韩国等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加入，另一方面又可能与 RCEP 产生冲突；而不断上涨的国内技术利益诉求将促使中国加入 TPP，但也需要重要的转型期。

山东论坛发起于 2015 年，是在山东省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由山东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高端学术论坛。论坛总部设在山东大学。该论坛依托齐鲁之邦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区位优势，立足山东大学百余年的学术积淀，以“聚焦东亚、交流互信、合作共赢”为宗旨，围绕“东亚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搭建政商学界交流互动的高端学术平台。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照片由山东论坛秘书处提供



图们江论坛 2016 召开

2016年10月15日，图们江论坛2016在延边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及韩国、朝鲜、日本、俄罗斯、德国、蒙古等国家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论坛。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顾问朴胜俊，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副校长郑万虎，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副校长苏赫巴托，首尔大学前任副校长柳根培，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张信刚，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苏忠民，延边大学原校长朴文一，延边大学校长朴永浩，延边州政府副州长赵龙虎，和龙市委书记金烈，和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庆文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延边大学副校长陈铁主持。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与包容：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路径”。图们江论坛以“依托多元文化、关注东亚区域、聚焦现实问题、

促进精英互动、凝聚发展共识、谋求合作共赢”为宗旨，为推动图们江区域文化交流，促进打造和平的合作环境，深化区域和谐发展与合作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朴永浩致开幕辞。他表示，延边大学始终坚持和践行多元文化融合与创新的理念，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和培养跨文化素质人才，以地缘优势和办学特色更好地促进东北亚各国学术交流与人文交流，承担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重要历史使命。他希望本届论坛能为图们江区域建设与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进一步扩大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苏忠民在致辞中指出，中朝、中韩、中俄、中蒙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各种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都为强化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强调，延边

大学在东北亚研究与图们江流域开发、长白山生物资源保护与开发等领域产出的一批标志性成果，为建设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边州政府副州长赵龙虎在致辞中展望了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延边地区以及图们江区域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和重大机遇。同时，他也肯定了延边大学为延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顾问朴胜俊、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副校长郑万虎、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副校长苏赫巴托及和龙市委书记金烈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香港城市大学张信刚、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亚历山大·卢金、早稻田大学土田健次郎、延边大学潘畅和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本届论坛的“政产学”圆桌会议以“生态民俗资源旅游开发”、“健康城市和健康产业发展”、“中朝跨境经贸合作”为主题，并在和龙市提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旅游城、健康城、开放城”的整体工作思路基础上，开展深入交流与探讨，为推动和龙市乃至延边州、吉林省对外经济高速发展和以延吉、珲春、和龙三点支撑的中、蒙、俄、韩、日、朝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建言献策。

在分论坛中，参会学者围绕经济、法学、哲学、文学和文化的热点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16日上午，“图们江论坛2016”闭幕。闭幕式由延边大学社科处处长金洪培主持。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朴灿奎对本届论坛做了总结。他说，本次论坛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第一，本届论坛围绕大会主题“和谐与包容：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路径”，汇聚了各国学者的

智慧和卓识，为探索图们江区域的国际合作开发和交流路径，进行了一次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学术研讨。第二，本届论坛是历届图们江论坛中规模最大、参加国别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从而为增进各国学者相互了解和交流，加深理解与互信，提供了一个重要学术平台。第三，本届论坛在分论坛举办方面，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尝试变革的努力。同国外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进行的合作，大大提高了图们江论坛参会人员层次和发表论文的水平，提升了图们江学术论坛的学术影响力。分论坛增加了人文社科类的比重，并与和龙市政府共同在和龙市举办了以“绿色转型与中朝经贸合作”为议题的“政产学”圆桌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延边大学副校长陈铁致闭幕辞。他说，本届“图们江论坛”在继承历届主题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时代的脉搏与主题，并在紧随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交流的实际前提下，围绕多个学术性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从多角度对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为图们江区域的开发与发展，为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届论坛深化了图们江论坛的理念：多元共存，合作共赢。在论坛中，与会学者智慧的碰撞为探索东北亚共同命运和发展机会开辟了新的路径。与会学者围绕图们江周边地区各国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发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展开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力求为解决当下问题建言献策，将论坛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层次。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 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6年10月17日，“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北外全球史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与泰国国际佛教大学共同主办。会议包括主旨报告和三场主题发言，围绕“鸠摩罗什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鸠摩罗什与丝绸之路”、“鸠摩罗什与汉地知识的迁移”三个主题展开。

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分别从“鸠摩罗什与知识的迁移”和“鸠摩罗什的影响”出发，作了大会主旨报告。

会议第一场主题发言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主持，吉林省社科院尚永琪研究员、北外校史馆馆长姚胜、亚非学院教师李灿分别以“鸠摩罗什东来机缘及相关历史问题”、“鸠摩罗什《十诵律》受学师从考述”和“鸠摩罗什何以会成为划时代的翻译家”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从鸠摩罗什的身世、生平、思想、学术及影响等角度，探讨了鸠摩罗什对印度和中国的重要研究意义。

《法音》编辑部主任桑吉扎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Kirill Solonin）教授和北外



亚非学院周利群老师在第二场主旨发言中，分别从“提升鸠摩罗什思想地位”“西夏人眼中的鸠摩罗什”以及“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印度天文学知识”三个角度，展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与会学者就“鸠摩罗什获得知识的途径”“鸠摩罗什译经是不是他本人最重要的功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第三场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王锦民副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编审和中国人民大学宣方副教授、张瀚墨副教授四位学者分别就“鸠摩罗什与凉州”、“鸠摩罗什对民族融合的贡献”、“鸠摩罗什所译禅经考辨”、“鸠摩罗什时代的佛经译者问题”等议题作了主题发言，涉及史学、翻译、宗教交流等领域，从历史人物活动的考证阐发、文献考据与文本分析等方面揭示出鸠摩罗什的不同身份与其所处纷繁斑斓时代背景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本次研讨会中，中外学者围绕“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议题，从历史、哲学、宗教、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出发，探讨鸠摩罗什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李雪涛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对鸠摩罗什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佛教内部，鸠摩罗什是中亚、印度和中国知识迁移中的一位核心人物，应当从区域知识迁移的框架中理解鸠摩罗什。正因如此，本次会议从语言学、翻译学等多角度对其身世、思想、学术影响的研究都颇有意义，这正是此次会议的意义所在。

全球史研究院

“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6年11月18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意大利玛切拉塔大学、意大利文化交流殷铎泽基金会协办的“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行政学院召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北京行政学院副院长韩久根分别代表两校在开幕式上致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夏伯嘉教授作为学者代表在开幕式

上作了发言。开幕式由北京行政学院院务委员袁吉富主持。

来自美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韩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67位专家学者，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围绕十二个分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以人文视角，揭示了16、17世纪以来的东、西文明交流的背景、过程和历史意义。十二个会议分议题分别是：一、西学在东亚：日本、韩国和越南；二、罗马教廷和耶稣会；三、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四、文献研究（一）；五、中西文化交流与历史人物：利类思、黄嘉略、



罗文藻、殷铎泽；六、文献研究（二）；七、传教士年报和字典研究；八、天主教在中国；九、知识的传播：从中国到欧洲；十、在华传教士的日常生活；十一、传教士与中文文学；十二、西方观念中的中国。

11月19日下午，“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北京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学报主编鄂振辉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张西教授平分别代表两校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发言，对此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闭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教授主持。

自15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全球贸易的兴起，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具特殊的历史意义。16世纪末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和其他传教士无疑是该段历史的关键人物。他们亲历中国，学习汉语和适应中国文化习俗，是

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全面接触与了解。与此同时，他们也把中国介绍到欧洲，使欧洲社会开始关注、了解中国，形成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通过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东西文明在相遇中互鉴，为人类文明的融合和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一历史进程共经历了大约两百年之久，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文明平等对话与相互学习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大会的主题紧密围绕16、17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展开，也是近几年来在中国举行的同类国际性会议中，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学术性较强的一次学术大会。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中国东南亚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 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6年11月5日，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主办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六十周年院庆暨‘中国东南亚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国内多所高校、研究院以及荷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和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在庆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六十周年院庆”的背景下拉开序幕。开幕式上，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育部社科司综合研究学部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朱威烈，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著名汉学家包乐史，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李一平致辞。他们分别表达了对“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六十周年院庆”的祝贺以及对莅临会议嘉宾、学者的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

开幕式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泰国法政大学张锡镇、北京大学吴杰伟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庄国土以“中国东南亚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为题，对“东南亚”这一概念的内涵发展演变进行了追溯，着重对国内外以及古今东南亚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指出了国内外东南亚研究的各自优势，分析了它们之间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同时，亦以严谨和乐观的学术态度，展望和预言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将迎来钻石十年！

张锡镇作了题为“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六十年回顾”的主旨发言，主要对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回顾了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六十年来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并深入剖析了期间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最后，呼吁加强东南亚国别政治研究，年轻人要勇于担当。

吴杰伟则以“中国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六十年回顾”为题，从“发展概况”、“办学特点”、“研究生培养”和“研究成果”等四个方面对东南亚各国语言在中国的教育教学、科研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梳理，详尽地阐述了东南亚语言教育与东南亚研究密不可分的关系。

主旨发言之后，大会围绕三个专题，即“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认知、反应与挑战，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关系进行了分组研讨。

一、“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认知、反应与挑战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国际社会尤其东南亚地区各国如何认知、作何反应不仅涉及彼此合作计划的展开，亦关乎这一区域安全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政府深入了解东南亚各国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针对这一差异做出合理、恰当的政策调整，显得至关重要。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李晨阳发表了题为“缅甸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的学术演讲。他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中缅合作，缅甸有着较强的合作意愿，但囿于对“一带一路”缺乏足够深入的认知，在具体的项目合作上出现了迟疑和犹豫。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平台基础上与缅甸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通过积极推进对缅公共外交，加大“一带一路”在缅的传播和宣传力度，消除缅方的误解和疑惑，增强缅方对“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互利和共赢”核心内涵的认同，以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治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泰战略合作：机遇、挑战与建议”的学术演讲。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双多边合作框架，有助于促进中泰合作提升层次、拓展领域、扩大规模，特别是为方兴未艾的投融资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契合泰国国家发展模式变革的现实诉求。不过，由于多边层面的地缘政治博弈、双边层面对互利合作的认知差异以及泰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分歧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存在，对中泰关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中泰战略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将面临诸多挑战。为此，中国政府有必要构造多层次全方位的“一带一路”交流与合作网络，进一步夯实中泰战略合作的发展基础。

越南外交学院外交战略研究所范海莲发表了题为“越南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认知与反应”的学术演讲。他认为，尽管越南经济专家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大多建议应采取警惕、谨慎和观望的态度，但是，专家们亦肯定了“一带一路”给越南带来的机遇，中越双方

应在这一框架下寻求互补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饶兆斌发表了题为“经济高于地缘政治：马来西亚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观点”的演讲。他认为，在马来西亚这个相对较小的国家，面对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地缘政治或现实主义的观点几乎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论述是经济高于地缘政治的。中国政府在宣传“一带一路”时，用词上相当用心思，不提倡用“战略”，提倡用“倡议”等等，没有给别人带来一个太过“中国中心”或过于扩张性的诠释。“一带一路”也许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合作的倡议这么简单，但“经济合作倡议”是中国政府希望传达的说法，目前而言，马来西亚还是非常能够接受这个说法。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世伦发表了题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中柬关系：一个国际援助关系下的风险分析”的学术演讲。他认为，由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与柬埔寨国家战略发展十年计划有共同理念，柬埔寨政府对这一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全力支持。但是共同愿景与理念下的两国发展与现实条件差异却是无可回避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端赖深化国别研究基础人才培养，也就是说中国在规划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同时，更需要的是培养具有深入而完整的国别研究专长的智库与幕僚，能更完整而深入的从政策末端的周边国家反馈我国相关政策在当地所面临的各项风险。质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共商、共建、共享六字为原则，在共赢、互信、互鉴的道路上，追求与周边国家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愿景目标。

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米拉发表了题为“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

的学术演讲。她认为，印尼政府响应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倡议，认为该倡议给印尼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旅游业、投资及贸易等领域带来了积极影响。对于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无论是支持印尼一中国的合作，还是提醒印尼政府在与中国建立联系时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以免落入中国建立的“霸权主义陷阱”的观点，印尼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应积极听取和研究，以负面观点和意见为鉴，有所作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开展经济互联互通建设，实现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亚系吴杰伟以“菲律宾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从整体上看，菲律宾国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注度是有限的，由于中菲领土争端上的冲突逐渐升级，菲律宾社会对于领土争端的态度，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容易直接与菲律宾对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但是，中菲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利因素，中国在菲律宾建立深远的、具有渗透力的影响，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只要我们把今后的交流做得更好、更规范、更深入，中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菲律宾民众也会逐渐消除因领土争端而产生的排斥心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李明江发表的题目为“支持、参与和协调：新加坡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他认为，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的积极正面的支持态度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观望和怀疑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加坡对“一带一路”

项目深度参与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其他东盟国家接受“一带一路”倡议；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深入开展，新加坡作为协调者的作用也会得到充分发挥。

对东南亚各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进行了解和考察至为重要，实际上，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东盟经济共同体，它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又如何呢？来自新加坡尤索夫东南亚研究院的赵洪访问研究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在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演讲。他认为，从目前情况看，“一带一路”与东南亚的发展战略对接，在国家层面上进展的比较顺利，多个项目都是在双边合作的框架下开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东盟内部的担忧，中国在这种由经济实力推动的双边合作中必然占据主导优势，会左右一些东盟成员尤其是弱小国的未来政策走向，从而引起东盟内部分化。不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为中国调整周边外交战略服务的，是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服务的，“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种新模式、新思路，将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创造更大的合作潜力和发展空间，使双方出现更加紧密联系的新的可能。中国要努力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愿景实现有效对接，除了加强在国家层面上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能合作对接和互补外，更要加强与东盟组织层面上的政策对接与协调。

二、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

南海地区的战略地位、经济的快速发展、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南海的价值。这一价值又决定了南海地区是国际

关系中竞争、冲突和合作的焦点地区之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素有南海问题的研究传统，因而，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成为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南海问题首先关乎其周边国家的利益与安全，准确把握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处理方式有利于我们维护国家的领海主权及其利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郑先武发表了题为“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的演讲。他认为，针对南海争端而发起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是印尼谋求均势与区域自主的安全战略、构建“东盟安全共同体”与逐步提升国防实力的安全政策、推动区域合作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区域主义、强化综合安全能力的大国角色的重要途径。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明亮以“马来西亚公开‘内政化’南海问题——途径、背景与影响”为题发表了演讲，主要探讨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南海问题如何成为马来西亚公开政治议程中的话题。从目前的效果看，2013年之后的中国“南海新政”，其负面效应远大过正面意义。无论是到曾母暗沙宣示主权，还是“值守”南康暗沙，都没有带来实际收益，反倒可能“推出了”马来西亚，损害了中马关系，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更趋恶化。对中国而言，合理的使用方式可能是：（1）为稳定中马关系，尽量淡化对曾母暗沙和南康暗沙的权利主张，淡化不等于放弃，仅是减少公开明确地坚持而已。（2）同马来西亚协商长期的大合同，采购马来西亚从曾母暗沙和南康暗沙海域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对而言，近距离运输也是对中国有利的。

南海问题亦涉及域外大国，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宣布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否关乎其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的加入，使得南

海问题更加复杂。如何应对美国的介入，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其在解决南海问题时的参与度，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外交学院外交系主任远喆发表了题为“奥巴马政府东南亚战略与地区再平衡”的演讲，他回顾了奥巴马从“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指明了奥巴马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特点，认为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一大成就是建立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持续的合作架构。目前，中—美—东南亚三边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葛红亮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评估”为题发表了演讲。葛红亮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既构成了美国新时期东南亚政策的重要一环，又与东南亚政策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不容置否的是，奥巴马南海政策在实践上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成效，不但有助于修复美国以往“单边主义”的形象，而且使美国—东盟国家关系在双边、多边渠道上均获得了实质性发展，并实现了冷战后美国在地区力量存在与影响力的空前规模增长。不可避免地依托于美国在地区及周边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与在国际舆论方面的主导地位，因而在实践中不自觉地推动了大国南海角逐的增强与地区安全局势的一再紧张，而地区均衡的“天平”也难免出现向美国倾斜，同时，引致了中国在南海强有力的维权、维稳的姿态与举措。

红河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邵建平发表了题为“战略意图与中美南海博弈”的演讲。邵建平认为，美国打着“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捍卫国际法、推动南海问题和平解决”的旗号，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将其作为制衡中国和平崛起、维护自身海洋霸权的抓手。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意图是要实现维权与维稳的平衡。为了更

好地表达自身战略意图，中国在继续捍卫南海主权权益的同时，要继续推进“双轨策略”、继续倡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争取有实质性突破、重视“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

除了领海、安全等利益争夺外，南海地区的渔业争端也愈加明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张宏洲发表了题为“渔业冲突、渔业安全和南海争端”的演讲。他认为，渔业争端或对有限渔业资源的竞争肯定会造成冲突，但往往会刺激世界许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然而，当渔业问题严重政治化和安全化时，渔业合作将变得极其困难。更糟糕的是，随着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渔业安全话语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存在的政治信任，使得南海区域渔业合作更不可能。因此，为了防止渔业事件造成南中国海的重大海上对抗，必须努力对南中国海的渔业问题进行处理。

本次会议中亦有关于菲律宾南海仲裁裁决的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罗国强发表了题为“论南海仲裁裁决的枉法性”的演讲。他指出，南海仲裁是菲律宾滥用国际法进行的恶意法律操作。仲裁庭在实体问题上，狭义地解释准据法，歪曲《公约》有关规定，对中方的行为和权益做限定解释，对菲方的行为和权益做宽泛解释，从而形成了罕见的一面倒裁决。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和逻辑，无论是在程序还是实体问题上都存在诸多滥用、歪曲和违背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之处。裁决明显偏袒菲方、故意歪曲事实和违背法律本意且不公正，属于典型的枉法裁决。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关系

东南亚是中国的近邻，彼此之间有较为密切而频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交流，海上丝

绸之路是双方往来的结晶和历史见证。当前，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给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新契机。

印尼马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华裔文化研究中心邱崇义发表了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印尼马都拉清真寺建筑艺术的影响”的演讲。他以符号学描述性和定性的方法对马都拉岛上的大清真寺的固体篱笆围墙、门装饰、屋顶的高度、楼层、功能区等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有极大的相似性。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林梅发表了题为“佐科维总统执政以来的印尼政治经济中印尼关系新发展”的演讲。林梅认为，佐科维总统上台后从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入手基本稳定了印尼国内的党派纷争以及国内经济发展趋缓的状态，在此基础上，中印尼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推进各领域合作，在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大舞台上开展交流合作。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祝家丰演讲的题目是“‘历尽一甲子的沧桑、犹未平等’：论种族政治下的马来西亚民族关系和华人处境”，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在种族政治下参加了主流政治和反对政治的历程。华人协商政治的实践是建立在支持在朝的华基政党和马来（巫统）政党。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华人与马来人的协商政治所达至的权力分享使华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但随着 1969 年种族流血冲突事件后，巫统政治势力的高度膨胀弱化了协商政治，华人社会的利益一一被蚕食，因此面临了各种困境。到了 2008 年和 2013 年大选前，华人的各种问题依然未获得解决，这种局面促使华人把选票投给反对党而引发了令人瞩目的政治海啸。

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周芳萍亦关心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关系，她发表了题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文化博弈和整合”的演讲，讲述了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文化博弈和适应情况。她认为，如果国家领导人要强势干预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限制和打压某个族群的文化发展，其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政府领袖不愿看到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发展所展现的韧性和蓬勃之生命力正是国家单一文化政策所引发出来的现象。这样的政策不但不能解决多元社会的族群整合问题，它还会导致国内的族群意识高涨，最终造成族群关系紧张与族裔抗争。为了落实国家文化共存的愿景，上至政府，下至人民，大家必须相互尊重其他族群的文化传统以减少族群隔阂与冲突，让生活增添色彩！

闭幕式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施雪琴致辞，她对本次会议上所讨论的“一带一路”与东南亚的认知与反应、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国际关系等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充分肯定了这些学术成果的前沿性和实效性，并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Ubi bene, ibi patria. 大抵心安即是家

——祝贺顾彬教授七十华诞（下）¹

李雪涛 /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六、翻译与创作

作为汉学家的顾彬，他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翻译。顾彬本人很重视翻译，他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从小说、散文到诗歌，从古代到现当代，他都尝试过。从德文版的《毛泽东文选》（*Mao Zedong Texte*, 1978）、《鲁迅文集》（*Werke in sechs Bänden*, 1994），到北岛、杨炼

的诗集，在很多德国读者的心目中，顾彬是一个译者。2005年顾彬60岁生日的时候，汉学系为他编了一本纪念文集，其中所列出的译作和译文目录有10页之多，²可见他翻译作品的量之大，其他汉学家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顾彬从1985至1995年间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论顾彬（Wolfgang Kubin）的汉学研究”的研究成果。

² *Festgabe Herrn Professor Dr. Wolfgang Kubin zur Vollendung seines sechzigsten Lebensjahres am 17. Dezember 2005*. S. 58-67.

中文系任教授，从事翻译（德汉/汉德）的教学和实践工作。之后他接替陶德文（Ralf Trauzettel, 1930—）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的主任教授一职，同样做着德中两种文化间的翻译工作。1999—2000年冬季学期，他在波恩大学开设了“翻译的艺术与手艺”（Kunst und Handwerk der Übersetzung）的讲座课，记得是在波恩大学主楼的13大教室，听讲的人并不多。这是对他的翻译实践进行理论化探讨的讲座，后来顾彬将这些讲座的内容结集成了《影之声》（*Die Stimme des Schattens*, 2001）予以出版。

顾彬承认，以前他不愿意别人把他看作译者，因为这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基本上得不到别人的重视。在作为学者和作家的同时，实际上他一直在做翻译的工作，翻译了很多依然在世的中国文学家的作品，同时也为德国的文化机构德中之间的交流做口译，因此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顾彬都实实在在是一个译者。¹

由于顾彬自己是译者，他对很多以往译本的批评显得异常慎重。记得我在硕士考试的时候，古代汉语考的是《孟子》的德文翻译。在准备的时候，我使用了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1916年的译本[Mong Dsi (Mong Ko). 1916]。在研读的过程

近年来,顾彬主持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受到了德语世界的关注,而主持编写这部巨著的甘苦,可能只有他自己知晓。

中,我发现卫礼贤翻译的一些孟子的概念不准确,还发现了错译、漏译的部分。当我带着发现的喜悦去跟顾彬讨论的时候,他很冷静地告诉我,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新的“重印”版本实际上删去了原书中很多的注释;二是卫礼贤的译本出版至今已经快一百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文跟今天的德文有很大的区别,当时很多的词汇都有基督教的色彩。而这些都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后来我读章学诚(1738—1801)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时,²觉得顾彬的说法是有其道理的,尽管卫礼贤并不是什么古人,但他的时代毕竟已经跟我们相隔了近一个世纪。

七、文学史研究

近年来,顾彬主持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受到了德语世界的关注,

而主持编写这部巨著的甘苦,可能只有他自己知晓。顾彬之所以要组织编写一套中国文学史,是因为在德语世界还没有这么一套完整的中国文学史。顾彬并不希望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罗列文学史家们的生平和著作,编写一部实用的工具书,他是要走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去,并以此展示中国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举例来讲,他对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所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就甚为不满。他接受了陶德文教授的观点,对即便令他反感的作品同样进行了批判性研究。³因此,他组织的这套文学史,是凸显了个人的文学史视角和方法论的文学史。

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顾彬的优势在于,他熟悉欧洲近现代的文学,因此他能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 1933—)说过:“20世纪中国文学如果脱离了西方语境就无法被理解。”⁴顾彬所揭示出的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批评观念上,都是自觉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并且对这些影响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顾彬自

1 Wolfgang Kubin, *Die Stimme des Schattens. Kunst und Handwerk des Übersetzens*, München: edition global, 2001. S. 5.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内篇二“文德”。

3 顾彬、王卓斐:《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位文学史家的心声》,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第180页。

4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己认为，这部充满个性的文学史的写作是将以下三个视角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第一，站在宗教末世论的角度，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救赎承诺；第二，将作家个体与国家、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第三，把中国作家置于知识分子的层面进行分析。¹此外，在这部文学史中，也尝试着将与中国文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如革命的问题、五四运动、乌托邦的问题等，从欧洲的立场予以理解、阐释。

2004年夏天我从波恩回国之后，开始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丛书。一直到2008年，第一批的三本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1月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汉学与国学的互动——以顾彬《中国文学史》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顾彬、国内外的中国文学史专家以及三卷的译者，进行了坦诚且深入的讨论。这套文学史的中译本影响甚广，除了东亚和东南亚的汉字文化圈之外，也影响到了西方一些非德语国家的汉学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汉学家们，很少能读懂除了母语、英语和汉语外的其他文字。2009年6月我去波恩开会的时候，顾彬告诉我说，当年4月耶鲁大学东亚学系也为他召开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讨会。由于美



国汉学界很少有人能读懂德文的著作，这个中译本成为他们研讨的基础。顾彬很看重他著作的中译本，那次在波恩开会的时候，他在开幕式上说：

我们这些汉学家在国内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正是由于我们著作的中译本，才使得我们在中国拥有了比在德国更多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书在改变着中国。而这是我们在几年前从来不敢想的事情。

实际上，正是中国文学这一共同研究的对象使得中西方的思想得以相互解释，也使相互批判成为可能。因此，德国当代诗人萨托里乌斯（Joachim Sartorius, 1946—）说：“顾彬是一位有家可归的流亡者，无论在波恩、北京、耶路撒冷或维珀斯多夫，他都有一种

流亡者的陌生感……”²我想，正是这种陌生感，能够使得双方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文化。

八、鲁迅：翻译和评价

1994年顾彬在瑞士的联合出版社（Unionsverlag）出版了他编译的七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³这是德语世界首次如此大规模地从中文原文翻译鲁迅的著作。顾彬在“后记”中指出：“每一个译本都是一种阐释，并依赖于译者本人的理解及其所处的时代。”⁴他对以往的德文译本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指出这些译本漏掉了一些看似无足轻重但却非常重要的字眼：例如《呐喊》“自序”中的第一句话：“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不论是卡尔·莫（Joseph Kalmer, 1889—1959），还是霍茨菲尔德（Johanna Herzfeldt, 1886—1977），抑或是杨宪益的英文译本，都没有将这个小品词“也”翻译出来。而这个“也”字不仅表现出了过去与现在时间上的转换，同时也表达了处于热情和失望矛盾之中的叙事者的内心。我想，从这个翻译的细节可以看出顾彬对鲁迅作品理解的深入程度。

顾彬认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就其形式的严谨来说，整个

1 顾彬、王卓斐：《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位文学史家的心声》，第181页。

2 萨托里乌斯：《平衡已开始流亡——论顾彬的抒情诗》，载顾彬著，莫光华、贺骥、林克译：《顾彬诗选》，成都：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页。

3 Lu Xun, *Werke in sechs Bänden*. Hrsg. v. Wolfgang Kubin. Zürich: Unionsverlag, 1994. 此书2015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再版的两卷简装版：Lu Xun, *Werke I & II*. Zürich: Unionsverlag, 2015.

4 Lu Xun, *Das trunkene Land*. Zürich: Unionsverlag, 1994. S. 174.

20 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够与作者(指鲁迅——引者注)匹敌。相似的情形只有在国际语境中才能找到。”¹ 一直到最近,他依然认为,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代表着“中国的声音”。他在译后记中写到:“思索的勇气和自嘲的能力事实上使鲁迅不仅成为了现代中国最富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这一特征的影响直到语言运用的层面之上都能看得到……”²

顾彬对杨宪益夫妇的鲁迅译本很不以为然:“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摆在他们眼前的是杨宪益夫妇的还是霍茨菲尔德的漏洞百出的版本。”³ 他之所以重组人马再次翻译鲁迅的作品,是因为他对以往的译本实在不满意。对像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这样的作家只能从英译本转移部分作品的做法,他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上文提到的卡尔莫,顾彬的评价是:“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包含着粗浅的理解而行文不畅的版本而已;繁杂的语句被改写或是被删除掉了。无论是原文的优美还是它的思想深度都不能从阅读中得到体察。”⁴ 顾彬进而对这类充斥着大量错误的翻译表示了他的怀



疑态度:“在难于理解但对解释来说显得举足轻重的段落里出现的大量细微错误常常使翻译的可靠性受到彻底的怀疑。”⁵

顾彬在翻译鲁迅的过程中,尽管认为当时大陆官方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四版,1981)的注释可供参考,但同时也表示出了他的批判性态度:“它们(指注释——引者注)常常是意识形态化的,离题太远而重复冗赘。”⁶ 更让顾彬不理解的是,这个版本省略了很多的内容:“许许多多的引文和影射没有给出注释,或许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或许由于相关的文献还没有公之于众。”⁷ 正因为如此,顾彬同时

使用了日文评注版的《鲁迅全集》(东京,自 1976 年开始出版)。

针对中国大陆对鲁迅的故意抬高,以及海外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无端贬低,顾彬的观点是:“既反对视鲁迅为纯粹革命的正统观点,也反对将鲁迅看作虚无主义者的反教条主义观点,我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理解。时代精神的批判性分析无意识是贯穿鲁迅作品始终的一条红线,而长久地坚持独立性也使作家付出了代价:寂寞、厌烦或者说是无聊和苦闷。”⁸ 对于中国来讲,顾彬认为鲁迅的意义在于创造了文学的语言,而对于西方来讲,则在于摆脱了服从精神:“马奈·斯珀波通过其写作所要求的那种对乌托邦终会破灭的毫无保留、不加粉饰的洞见,似乎在作为作家和人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中得到了试验。”⁹

顾彬善于捕捉到中西诗学的异处,他同样善于将中国文学特殊的审美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展现在德国的读者面前。在鲁迅那里,这一独特的写作方式有时并非中西的差异,而更多是传统与现代的不同:

面对不再是确定的、也不能确定的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复杂问题,现

1 顾彬著,梁展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文集〉后记》,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 年第 5 期,第 42 页。

2 同上。

3 同上,第 43 页。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此处引文见第 42 页。

8 同上,第 44—45 页。

9 同上,第 45 页。

代作家采取了一种写作形式，他不主张终极而主张暂时的东西，不存在“叙述的过程”，而倾向于情绪与感觉的自由无穷无尽状态。世界成了幻想的材料和表演场，语言开始从陈述中解放出来。¹

《彷徨》以及其他的作品所展示给读者的是，清醒之后并没有出路，这是鲁迅一再告诫现代人的窘境。顾彬之所以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与这些文学家们所揭示的现代性有关。

九、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作家

顾彬认为，1911年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帝国的解体，以及在此之前的科举制度之废除，导致了中国人“整体性的丧失”，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的内在基础。现代性便是由于整体性的终结而产生的：“生活的内在意义”瓦解了，人变成了一个寻觅者和一个流浪者。人们为失去了传统而绝望，并且传统的资源已经无法提供解决个体“忧郁”的任何解决办法了。因为在人与上帝的分离中，在其先验性的无家可归中，人认识到他自己和他的整个存在都成问题的。²这是顾彬借用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的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界定。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家有关“忧

顾彬认为，1911年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帝国的解体，以及在此之前的科举制度之废除，导致了中国人“整体性的丧失”，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的内在基础。

郁”和“苦闷”的相关研究，可以说都是在追问他们和现代性的关系，而这绝不仅仅局限在东亚一隅：那个时候中国的确有一个很好的现代性文学，这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没办法比的。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批至今未被关注的作品，通过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它们‘关键文本’的价值。这些作品，不仅在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且在对20世纪人类心灵的理解中具有关键作用。”⁴

顾彬认为，现代人存在的碎片化在鲁迅的第二部小说《彷徨》（1924—1926）中“得到了犀利而深刻的描绘”。“这部小说集展示的是这样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他欲前行，但不知道要去何方，因为在任何地方他都不再有终极归宿。”⁵顾彬同样在叶圣陶的小说《倪

焕之》（1928）中看到了一个处于持续变动的世界中的现代人的状态。而这不论是夏志清（1921—2013），还是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抑或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 1952—1992）都是没有真正认识到的。

顾彬认为，通过中国现代作家我们可以了解20世纪文学发展的所有问题，亦即上帝死了之后人该怎么办的问题。不论是郭沫若在《天狗》中以“我是”的句式表现出的自我主体，还是鲁迅在《彷徨》和《野草》中描写的在路上追求理想的人，这些绝不仅仅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同样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悲剧。因此顾彬的观点是，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代表着20世纪的中国，也代表着这一时代的欧洲，是具有世界代表性的。⁶

十、当代文学与市场

如今顾彬尽管可谓名声大噪，但他依然保持着书生本色，显得与当今的社会是那么格格不入。

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我一直认为跟他作为一个崇尚高雅品位的唯美主义者有关。举例来讲，尽管他在波鸿大学跟随霍福曼（Alfred Hoffmann, 1911—1997）学习过多年的汉学，但他依然无法容忍这座大学和所在城

1 顾彬著，梁展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文集〉后记》，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第51—52页。

2 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76页。

3 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第74页。

4 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第76页。

5 同上，第76页。

6 顾彬：《郭沫若与翻译的现代性》，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第116—120页。

市的平庸风格。他曾在伯尔尼的一次演讲中，非常委婉地说了他“对这所大学及所在城市的建筑充满了困惑和不解”。¹

他在大学跟霍福曼所学的是唐代的诗歌和宋代的散文，正是由于他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情有独钟，致使他用中古和近代的文学审美来看待当代的文学成就，这其中的断裂是必然的。他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曾经走过这样的歧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也是一段步入歧途的历史，而这是东西方现代性的产物。”²

2010年12月4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驻京评论员西蒙（Mark Siemons）对顾彬与杨锐在中央九套英语对谈的报道和评论，顾彬对文学的市场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一直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乃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时期；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就把自己卖给了政治；而1992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卖给了市场，是被市场腐蚀了的文学。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而走向市场经济后，由于市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很多人便天真地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而没有

看到“市场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³

实际上，正是这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破坏了文化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毁掉了人类的伦理道德。随着语言的商业化，知识分子也逐渐消失于公共空间的舞台上，这当然不仅仅在中国，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已。顾彬不能容忍的是，中国作家变成了这些消遣文化的参与者，“将自己那灰暗的躯体作为献祭的牺牲”。⁴由于过度商业化和意识形态作祟，作家的批判精神渐遭抛弃。因此，顾彬祈盼发自当代作家心声的中国的声音。

有关当代文学的市场化、商业化，有中国学者也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作家缺乏意志力，不能为他们的艺术忍受磨难，而是为商业世界服务。这里可以看出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忧虑：商业化销蚀了文学的灵魂和规范。”⁵令顾彬稍感安慰的是，中国的很多诗人没有太多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得到市场的推崇，他们依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所以不会出卖自己，还会专注于语言和艺术的价值。

顾彬认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1939—）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

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他发现，作为犹太人的葛浩文删去了《狼图腾》的最后一部分，因为从政治正确性上来讲，这一部分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为他（指葛浩文——引者注）决定了该书的英文版应该怎么样，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立场。”⁶

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某些作家的痛斥，对文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非难，我以为都说到了痛处。鲁迅晚年曾引用郑板桥（1693—1765）的两句诗赠给准备为他写传的日本作家增田涉（1903—1977）：“抓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想这也正是顾彬被很多中国学者所不能容忍的最主要的原因吧，因为他犀利的言论似乎触动了某些中国人民族自尊的敏感神经。

十一、诗人顾彬

多年前，我在跟顾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曾主持过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的翻译工作，顾彬为这部译本撰写了中文版序。1987年诗人冯至（1905—1993）获得了联邦德国国际文化奖，顾彬曾经将冯至的《十四行诗》译成了德文。他从斯

1 顾彬：《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位文学史家的心声》，第179页。

2 同上，第181页。

3 赖默尔·格罗尼迈尔（Reimer Gronemeyer）著，梁晶晶、陈群译，李雪涛校：《21世纪的十诫：新时期的道德与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4 同上，第99页。

5 李公明：《让当代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开端》，载《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第9页。

6 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载《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3页。

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那里得知，冯至在海德堡留学的时候，曾听过雅斯贝尔斯的课，并且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及其有关“交往”（Kommunikation）的理论。因此，顾彬希望我能从雅斯贝尔斯的学说，对冯至的诗进行分析。由于我对诗没有太多的感觉，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我至今依然认为很有意义的选题。



作为诗人的顾彬在另一位德国诗人萨托里乌斯（Joachim Sarorius, 1946—）眼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呢？“他的面孔流露出青年人的坦诚并且爬满了疲倦的明显的皱纹，这张脸彰显了他的秉性：一位个人主义者、严肃的学者、工作狂和文学的仆人。”¹ 忧郁的性格好像是很多人对顾彬的共同评价。张洁对柏林时期的顾彬写道：“在西柏林的时候，我们常和沃尔夫冈·库宾先生开玩笑。他很少笑，面上总含苦味，就是笑起来，也不过是兑了点水而已，苦仍苦的。他解释说：‘内向和忧郁，是奥地利的风格。’”² 顾彬有一半的维也纳血统，他将自己忧郁的性格归于古老的奥匈帝国首都的传统。

至今顾彬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在汉学研究方面，顾彬是一位冷静的研究者，而一旦进入诗歌的创作或吟诵，他马上变成了恢弘旷达的歌者：**Genus irritabile vatum**（诗人的敏感性）。

我一直以为，诗歌代表着青春的激情，似乎是对生命某一时刻的孤注一掷。有一年的夏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很多他同辈的学者都已经过世了，而他由于每天骑自行车，每周踢足球，并且常常去爬山，所以依然保持着健康的体魄。我想他不仅仅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更有鹤发童颜的精神，这也是他的诗性的源泉。

2010年8月顾彬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集得以出版，³这是当代活着的德国诗人的首部中文译本。顾彬谦虚地说他根本不配有这样的殊荣，但作为第一位被译成中文的诗人，看得出他还是异常兴奋的。诗集是从顾彬近年来出版了的三部诗集（分别是《新离骚（旧绝望之新歌）》《影舞者》以及《愚人塔》）选编而成的。萨托里乌斯对顾彬的《新离骚》有如下的评论：

从诗集中我们窥见了一位沉思的、

忧郁的诗人，他有准确的判断力和精简到极其简约的才华；我们窥见了一位从不进行道德说教的道德哲学家，他奉献给我们的是硬性组合的、严肃而艰涩的诗歌，他对待读者比较苛刻，但是也期待读者有所反应和进行研究。……历史意识、理性塑造和语言与现实世界的严肃交流构成了一个三和弦，该三和弦赋予顾彬的诗歌以丰富的意蕴并且能引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⁴

我想这是对顾彬诗歌的精到评价。

北岛认为，顾彬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我也觉得在顾彬的诗中浓缩了丰富的人生体悟，他善于用简约之笔墨勾勒出他对人生的态度。

顾彬翻译出版了很多中国当代诗人的诗作，最多的三位诗人是北岛、梁秉钧和杨炼，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作者和译者。同样作为诗人，他们可谓心性相投：都喜爱美食、美酒，同时作为世间的流亡者在世界各地漫游，在任何地方都有陌生感……正因为此，他与很多中国诗人惺惺相惜。2010年3月8日诗人张枣去世后，顾彬为他写了《最后的歌吟已远逝——祭张枣（1962—2010）》的悼念文章，认为这位年轻早逝的诗人“在其为人类创作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中留下了不朽的诗行。对于这位中国诗人，我们被诸如‘椅子坐进冬天……’这样的

1 萨托里乌斯：《平衡已开始流亡——论顾彬的抒情诗》，第1页。

2 张洁：《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载陈丹晨、柳萌选编《奥地利随想曲》，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135—136页。

3 顾彬著，莫光华、贺骥、林克译：《顾彬诗选》。

4 萨托里乌斯：《平衡已开始流亡——论顾彬的抒情诗》，第2页。

诗句感动，而且刻骨铭心。”¹让顾彬稍感欣慰的是，张枣最终葬在了图宾根：“图宾根是如此美丽，是一个死亡的好归宿。既然他如此紧密地与荷尔德林之路相连，它是唯一适合于他的适宜的栖息的地方。”²“在五针松下 / 摆渡人与诗人 / 何其绝望的一对。”³顾彬诗歌的主题大都是跟死亡、坟墓、故乡、异域、忧郁等有关，萨托里乌斯认为：“诗人顾彬要以一种压抑的、不完美的美学来适应这个日益空虚的世界。他要用各种暗示、用意象与历史的关联来寻求平衡，以使我们重新熟悉我们之间的平衡。”⁴

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为顾彬画像的话，是画他站在讲坛上的侃侃而谈，还是坐在办公室中的埋头工作，是诗歌朗诵会上的淡定吟诵，还是足球场上的叱咤驰骋……2008年11月在北外举办他的《中国文学史》的研讨会上，我们送给他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国先生式的顾彬泥人。在接受的时候他幽默地笑着问：“这是我吗？”我明白，他言下之意是，你们认为我只是一位教书的先生吗？

邵雍（1011—1077）在《安乐窝中四长吟》的开头总结了他人生的四件大事：“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篇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



湛天真。”（《击壤集》卷九）康节先生夏居安乐窝，冬住云溪洞，常年与“四物”相伴：吟诗、著书、焚香、饮酒。我想如果将“焚香”改为“教书”的话，那么这对顾彬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顾彬年轻时有过很多梦想：神学家、音乐家、足球运动员、导游、中学老师……他当然不可能同时成为这些，但人的一生中，若能有不同的生命角色，一定会有另外一种喜悦吧：“一切洞穴敞开 / 只为一次梦中的漫游。”⁵

十二、“书桌前的苦行僧”

顾彬的勤奋是出了名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维也纳的汉学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女士在2005年12月1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FAZ）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顾彬称作“书桌前的苦行僧”（ein “Mönch am Schreibtisch”），并且配了一幅在写字台前的顾彬的黑白照片。那年顾彬进入花甲之年，六十一甲子。穿着深色短袖的顾彬，挺坐在书桌前，干瘦的他身后是两排书架。他双手摆在身前，左手扶脸，右手自然地横放在了桌上。稍微显得有些乱的分头，几乎全都白了。额头上几道深深的沟壑，昭示着岁月的沧桑。他双眼凝视着前方，执着且淡定，仿佛真的能透视他人的灵魂，给人以强烈的震慑力。顾彬剑眉深锁，一副忧虑的样子，仿佛内心有难以排遣的孤寂。他紧闭着双唇，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小臂和脸上的青筋，显示出经常运动的顾彬的体魄的力量……总之，这样一幅棱角分明的黑白照片，既显示出了顾彬进入耳顺之后的稳重与深邃，同时也显示出了年轻人的血气与方刚。

我在波恩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跟顾彬聊到日常的饮食起居，我那时基本上是夜里一点左右睡觉，早上八点起床。他觉得我太过享受，这我从他的表情中看得出来，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而他自己即使睡得再晚，早上五六点钟他也已经开始写作了。他的大部分诗，都是在别人还在梦乡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幻想每一觉都是个

1 顾彬：《最后的歌吟已远逝——祭张枣（1962—2010）》，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

2 同上。

3 顾彬著，莫光华、贺骥、林克译：《顾彬诗选》，第46页。

4 萨托里乌斯：《平衡已开始流亡——论顾彬的抒情诗》，第3页。

5 顾彬著，莫光华、贺骥、林克译：《顾彬诗选》，第23页。

贼 / 他更爱偷窃岁月 / 并摆渡过去。”¹ 我一直认为, 顾彬偏爱夜和冬天, 因为他们相互属于: “当一切都去了 / 我们乘一张羊皮纸 / 飘入傍晚和冬天 / 渴望找到那个声音 / 我们曾是的声音。”² “我不喜欢期待光明, / 它的面孔变幻莫测, / 忽而殷红, 忽而灰暗。”³ 而黑夜只有一种颜色。

跟其他波恩大学的教授不同, 我跟顾彬见面从来不需要预约, 也不需要在他的接待时间去找他, 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在他的书房兼办公室中备课或写作。那里摆满了书籍和文稿, 往往没有下脚的空, “一块窄地也是一个狭窄的故乡”。⁴ 我回北京后, 有时穗子会在北京时间的上午给我打电话, 这个时间的德国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 他们两口子都还在不亦乐乎地忙乎着。

在波恩时, 作为系主任的顾彬每学期都还要上十几节课, 包括好几种不同类型的课。以 1999—2000 年度冬季学期为例, 他在全校开有“德中关系”和“翻译的艺术与手艺”两门讲座课, “中国的历史和历史描述”的高级研讨班, 以及“古代汉语入门”的练习课。尽管他有时也会抱怨, 不过他也清楚, 作为教授这些都是他的分内之事。除

除了上课之外, 顾彬还编辑两本跟汉学和亚洲文化相关的德文刊物:《袖珍汉学——中国精神杂志》(*Minima Sinica. Zeitschrift zum chinesischen Geist*) 和《东方 / 方向——亚洲文化杂志》(*Orientierungen. 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

除了上课之外, 顾彬还编辑两本跟汉学和亚洲文化相关的德文刊物:《袖珍汉学——中国精神杂志》(*Minima Sinica. Zeitschrift zum chinesischen Geist*) 和《东方 / 方向——亚洲文化杂志》(*Orientierungen. 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

几年前北岛说: “顾彬穗子两口子在编一本名叫《袖珍汉学》的德文杂志, 忙得天昏地暗。”⁵ 如今不仅多一本杂志, 其他事情也更多了。2009 年赶上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 顾彬出版了十几本书, 尽管这些书是他多年来的积淀, 但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些年是何等勤奋! 2005 年 12 月在顾彬 60 岁的小纪念册中,⁶ 截至当时

的出版物仅目录就有 54 页之多, 可谓: 渊智达洞, 累学之功也。

在波恩做教授的时候, 顾彬每年的假期都在中国的大学里讲学, 大都是经北京后飞回德国。我的感觉是, 那时每次他从山东、四川、江苏等地的大学教完书来北京后都显得疲惫不堪。他常常抱怨备课的时间太长, 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和写作。但等到下一个假期, 他依然乐此不疲地欣然前往。2006 年 3 月的一天, 顾彬从三峡大学来到北京, 我和王家新接他到人大演讲, 他不顾旅途的劳累, 直接就到了演讲的现场。尽管他的演讲很精彩, 但依然掩盖不住蒙袂辑屣的神情。晚饭后他被安顿在人大西门内的一处专家公寓里, 到了房间, 他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翻出了几朵已经蔫了的花, 告诉我那是他在三峡大学的学生送给他的。“很久没有人给我送花了, 这些还是他们自己采的。”顾彬告诉我, 他在三峡大学的学生们有多么淳朴可爱。我在公寓里找了半天, 才将花插在了喝剩了的矿泉水瓶子里。第二天下午他去清华的操场踢了一下午的足球, 晚上我们再在饭桌上见面的时候,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顾彬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1 顾彬著, 莫光华、贺骥、林克译:《顾彬诗选》, 第 43 页。

2 同上, 第 48 页。

3 同上, 第 63 页。

4 同上, 第 23 页。

5 北岛:《空山》, 载北岛《午夜之门》,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第 145 页。

6 *Festgabe. Herrn Professor Dr. Wolfgang Kubin zur Vollendung seines sechzigsten Lebensjahres am 17. Dezember 2005*, Bonn: Sinologie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12.12.2005.

2010年9月他来北外小住的时候，我安排他住在了西院的专家公寓里。因为他要去很多地方讲课、演讲，所以他带来了很多的书籍和字典。一本《新华字典》、一本《精选汉德德汉词典》以及一本马守真（Robert Henry Mathews, 1877—1970）的《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早已成了顾彬的随身物，他之所以喜欢使用这本内地会传教士的老词典，是因为它收录有很多古汉语的字词。每次我去找他，都看到他或者在备课，或者在写作，字典和其他的书籍摊了一地。他离开北京之前，我劝他将这些辞书留在我这里，因为他还要回来。他想了想，还是拖着重重的皮箱，将所有的书都带上了飞机，之后又全带了回来。这些书籍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每当此时，我都会想到张问陶（1764—1814）两句诗“留得累人身外物，半肩行李半肩书”（《庚戌九月三日移居松筠》），觉得这是此时顾彬的绝好写照。我曾建议他将这些辞书扫描成pdf的文档存在他电脑的硬盘里，随时都可以使用。顾彬很是怀疑地问：“这样真的可信吗？”我知道，跟自己的身体一样，掂在手里有分量的纸书，他用着踏实！顾彬在献给黄金铭（Wong Kam-ming）的诗中写道：“贫穷的书生一无所有，/ 书卷和毛笔拥有

他。”¹这也是对他惟妙惟肖的勾勒。

十三、“拼却老红一万点”

2011年3月份的时候，时任北外校长的陈雨露教授有一次找到我，问我是否可以以为北外引进一两位国际知名的教授。我当时就想到了2月份在波恩大学荣休的顾彬教授。经过几次跟顾彬和穗子的磋商后，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五年的安排。7月份顾彬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暑期班的讲授时，专门到了北外，签署了相关的合同文件。

2011—2012学年的秋季学期，顾彬教授开了两门课：“汉学研究新视野”以及“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前者主要讲授目前在欧洲汉学界（主要是德语世界）所出版的新书中所涉及到的新译本、新材料、新观点等，后者则对中国与德国交流的历史加以梳理，目的也是为了今天我们更好地了解 and 接受对方。这两门课的讲稿也构成了后来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的“听顾彬讲汉学”第一辑的前两本。²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肖鹰教授曾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亏欠顾彬的很多，很多人往往从记者对顾彬采访的只言片语出发，来讨伐他。肖鹰认为，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点，顾彬都能读到，但是顾彬用德文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的

观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读懂的。我很赞同肖鹰的这段话的意思，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断组织翻译顾彬论著最主要的原因。肖鹰根据他与顾彬多年的交谈经验和感受，认为顾彬所谓“真正的对话”包含三个特点：热情的追问、真诚的倾听和坦率的表达。对于肖鹰提到的这三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顾彬在与中国学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提问。他时时刻刻带着一个小的札记本，不论想到了什么，总会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每次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地方见面，他一般都会早到，我到的时候，他不是在读着什么，就是在记着什么。很多“大”学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再向别人提问了：“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³朱熹（1130—1200）认为，那些自以为阅历深，通达事理而不肯放下架子向别人请教的人，其实是没有智慧的。

在倾听方面，我觉得顾彬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每次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都会很有礼貌地看着你，平心静气地让人把话说完，之后他才缓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不论你的观点是深刻还是浅显，他都会从中找到他认为有意思的地方，使谈话继续下去。顾彬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推崇鲁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鲁迅敢

1 顾彬著，莫光华、贺骥、林克译：《顾彬诗选》，第22页。

2 顾彬著，李雪涛、熊英整理：《汉学研究新视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顾彬著，李雪涛、张欣编：《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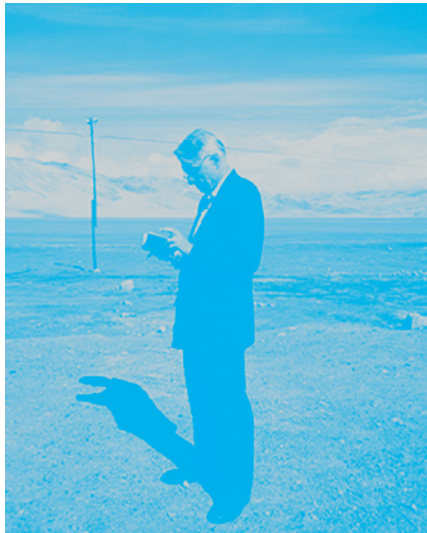
3 朱高正：《近思录通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文坛像鲁迅一样敢于站出来讲话的作家，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也是在这些年中他为当代“爱国”的批评家所诟病的理由，因为他常常不识时务地批判当代的一些作家和明星人士，而从目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来看的话，这些人是不容批判的。

在波恩大学跟随顾彬五年的时间，当时只是感觉到他的话极少，只有在必须说的时候，才说上一两句话。跟德国其他教授一样，他的讲座课也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之后想来，受到他的教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当时未必体会得到，但是多年后才会慢慢地发现。不过，顾彬的研讨班课实在精彩得很，借用熊伟（1911—1994）回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我曾亲听海德格尔讲课三年，总觉得他不像一个教授在贩卖哲学知识，而是一个诗人，满堂吟咏。”¹ 作为诗人的顾彬更是这样。

顾彬很少以长者自居，他每每在课堂上都提出很多的问题，与同学们共同思考、共同讨论。清代学者李惺（1785—1863）说：“师以质疑，友以析疑。师友者，学问之资也。”（李惺《西沔外集》“冰言补”）对于我们来讲，顾彬教授不仅解惑答疑，也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辨析疑难，可谓亦师亦友。

顾彬杖乡之年来到北外，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



宋人杨万里（1127—1206）诗中有两句：“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杨万里《又和风雨二首》）我认为这是对作为前辈学者的顾彬，除了著述、翻译之外，依然不遗余力地培育新人的最得体的写照。如果再借用顾彬教授喜爱的唐代诗人杜牧（803—约852）诗句的话，我会选脍炙人口的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² 如今顾彬在中国拥有比在波恩更多的弟子。

欧洲学术界有在教授60岁后逢五逢十出版纪念论文集（德文叫 *Festschrift*）的传统，除了共同庆祝教授的生日外，同时也为同道创造一个发表的园地。顾彬60岁的时候，波恩大学汉学系为他祝寿，他的三个学生献上了祝词：“享受着自由的视野，您如今仿佛生活在一座高山之巅，而正是在攀登的

过程中您打开了中国语言、文学以及哲学那令人难忘的全景图像。”³ 并为他出版了厚厚的一册纪念文集。学术的用场在哪里？我以为，除了纯粹的研究功用外，也应当成为侍奉生命诸阶段大事的手段。2011年2月顾彬从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历史学家廉亚明（Ralph Kauz）接替他成为了波恩的下一任教授。廉教授的专业是中国与波斯的历史交流，他入主波恩大学汉学系无疑改变了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更加注重中国历史的研究，从而使波恩的汉学朝着更加宽阔的领域迈进。如今步入从心所欲年龄的顾彬，已经超越一个甲子周期。如果说中华帝国解体后时间由循环的传统观念逐渐为线性的观念所代替的话，那么指向未来的无限远景也同时被展现在了中国人面前。从2011年来北外任特聘教授，顾彬已经在中国连续任教了四年之久，北京也成为了他的故乡。罗马诗人巴库维乌斯（Marcus Pacuvius, 220 – c. 130 BC）有 *Ubi bene, ibi patria* 的说法（*Teucer, fr. 291*），意思是：哪里好，哪里就是家乡。这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种桃杏》的一句诗：“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如今，阅世既久的顾彬，我想如今一定参透了其中的三昧。

1 熊伟：《海德格尔是一位哲学家——我的回忆》，载熊伟《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2 Wolfgang Kubin, *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 Versuch einer Deutu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6.

3 *Festgabe Herrn Professor Dr. Wolfgang Kubin zur Vollendung seines sechzigsten Lebensjahres am 17. Dezember 2005*. S. 4.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